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王万森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6.1
ISBN 7-5333-1608-8

Ⅰ.沂... Ⅱ.王... Ⅲ.①现代文学—研究—山东省②文化史—研究—山东省 Ⅳ.①I206.6②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116 **号**

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
王万森 周志雄 李建英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 - 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9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608—8/I·318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导论　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 1

上篇　综论

一、文化追溯与文学扫描…… 1
二、沂蒙文化与沂蒙文学的历史考察…… 4
三、20 世纪革命语境中的沂蒙文学 …… 45
四、“革命—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与超越…… 60
五、革命语境中的沂蒙女性叙事 …… 93
六、在建构与演进之间…… 113

中篇　文学考察

一、现实主义的时代新质
——读《苗得雨散文集》 …… 115
二、当代文坛的黄钟大吕之音
——李存葆论 …… 121
三、幽默：沂蒙文化和文体风格
——读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小说”…… 131
四、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
——论赵德发的小说…… 141

五、求索蜕变的灵魂
——论王兆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创作 …… 165
六、人性之美与抒情派文学
——重读苗长水的小说 …… 181
七、在沂蒙文化的星空下
——论当代沂蒙作家的小说创作 …… 191

下篇 作家访谈

一、略谈沂蒙文学
——苗得雨访谈录 …… 206
二、举要治繁 含宏万汇
——李存葆访谈录 …… 213
三、在土地上吟咏，吟歌，甚至吟啸
——赵德发访谈录 …… 227
四、长长的流水 脉脉的温情
——苗长水访谈录 …… 242
五、沂蒙民间文化的歌者
——刘玉堂访谈录 …… 257
六、都市里的“乡下人”
——王兆军访谈录 …… 265
七、走近沂蒙
——沂蒙文化实地访谈录 …… 302

参考文献…… 310
后记…… 316

2

导论　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沂蒙文化既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传统和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现代意识的凝聚和熔铸。相对于文化断层说而言，沂蒙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链。在自史前文化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它汇聚了从东夷文化以来鲁文化和齐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经历了烽火硝烟的洗礼，用流血牺牲和崇高心灵筑起为革命奉献的历史丰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沂蒙人民在五大革命老区之中率先脱贫致富，以令人鼓舞的经济崛起的骄人业绩，为老区的经济现代化积累了新鲜经验。也就是说，在民族传统、革命斗争和经济改革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形态中沂蒙人民都以其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无私无畏的奉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果。

沂蒙这块土地同我们整个民族一道历经磨难，近一个世纪以来更是饱受战乱之苦，沂蒙文化在历史风雨中穿行。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既有普遍性的意义，又突现为独特的指涉。历史的转型可以将历史分割成片段，留下文化失衡的深深印痕。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化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救亡文化，各自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文化方向，两者存在互融互动的关系的

1

同时，又不无牴牾和龃龉。沂蒙文化虽然无以脱出与此相似的轨迹，但在文化发展中却保留了地域文化的特有形态。构成沂蒙文化的三大主要因素是表征传统文化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文化。三者之间在价值取向、生成形态和历史地位诸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但是在沂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三种文化之间更主要地表现为相互融合从而汇成不停顿地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其中，革命文化的推动作用尤其显著。革命的历史运动为沂蒙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平台。奋不顾身的群众斗争，前赴后继的支前运动，红嫂式的无私奉献，决战孟良崮所焕发的战斗豪情，发生在革命斗争年代沂蒙人民的英雄壮举，彰显着高尚壮美的沂蒙精神，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的深层熔铸。作为著名根据地的沂蒙地区，已是革命文化的重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日益深入人心。齐鲁文化中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崇尚真理，忠诚勇毅，为正义事业慷慨奉献等精神内涵，在革命年代里重铸并升华为崭新的文化凝聚力。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伴随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战争，沂蒙大地上萌发着现代意识。翻身运动和对敌斗争启迪着阶级群体中广大农民的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沂蒙老区的女性，正是在拥军支前、参加识字班、闹翻身的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沂蒙儿女伴随着革命步伐萌生了现代生活的憧憬，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向往。齐鲁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早已被沂蒙的历史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生活中进一步得到确证。

在三大文化要素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沂蒙文化复合型的文化结构。沂蒙文化有着复杂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时代内涵。

2

这里既是革命老区又是经济新区，既存在着古老的传统又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既弥漫着纯朴的民风又张扬着改革的锐气。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形态共时并存，既有东夷文化的遗存，也有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传统以及革命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来文化、商品文化、大众文化纷至沓来。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看似相互冲突甚至矛盾对立的文化在这里却能够共时性并存，构成对称模式的历史文化形态。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耕读文化与文士文化，战争文化与亲情文化，抗灾文化与游乐文化，过往时代的兵文化与匪文化，冲突矛盾的双方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着转化与异变。

沂蒙文化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性质，又具有地域性的显著特点，既有繁复的历史蕴含，又构成特有的文化模式，由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综合生成，不可仅从单一方面作出简单化的抽象概括，而应借助现代科学方法深入探讨。文化是能够再生性创造新的生命力的机体。各文化要素之间沿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齐鲁文化是沂蒙文化的深层结构，作为文化基础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发展。现代文化是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因素，不断激发文化的生命力，并给沂蒙文化注入新的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走进沂蒙文化的导引，也是探索文化心理的金钥匙。以此为导引，我们得以用各种不同方式，从各个不同视角观察和阐释沂蒙文化，其中，文学是不可忽视的视角。文学与沂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沂蒙文化和文化心理的丰富内涵及其结构模式，为文学的审美想象开拓了广阔空间。沂蒙走向现代化的启示，沂蒙文化所演绎的民族精神重构的寓言，成为文学创造的重要资源。

3

文学不仅表现社会历史的文化形态，而且尤其善于揭示心理情感和精神灵魂的奥秘。由文学视角考察沂蒙文化，着重探询沂蒙革命老区精神。这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复合多元的文化形态。在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沂蒙精神表现为农业文明中的宽容仁爱、吃苦耐劳、勤俭质朴、敬畏自然、天人合一；时代风浪中，勇于斗争、乐于奉献、与命运抗争；历史变革中，敢为天下先、乐观进取、与时俱进、挑战现实、挑战传统、挑战自我。它既有黄河文化的沉淀，又有滨海文化的开放。在文学叙事中，沂蒙文化精神像一条流淌的河，汇集涓涓溪流而奔腾不息。沂蒙文化自史前文化的早期发展，东夷文化的生成至今源远流长。文学叙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展示的是与历史学、社会学不同的社会人文景观，也与文化研究、革命史研究、党史研究、战争史研究等迥异。首先，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促使文学由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转向对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同时仍沿着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建构顺应历史发展的文学思维。沂蒙文学对于历史叙事，特别是革命的宏大叙事，无疑是进行着审美的也是日常的叙事补白，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叙事所难以承当的。不仅有像《红日》那样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世俗人生和平民百姓的乡土故事，如钓鱼台纪事、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凡俗的女性生活等。其次，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是“人”，战争中的人，变革时代的人，沂水蒙山风俗中的男女老少，渗透在悲欢沉浮中的是人性关注和人道主义情怀，更多的是对乐观、温柔、坚毅、敦厚的农民性格的描摹，对人性和心灵世界的探索。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沂蒙

4

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作家。自五四以来，沂蒙作家为齐鲁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特殊贡献，从被茅盾称为“彗星似的一现”的文化先驱王思玷、左翼作家刘一梦、革命老区的“孩子诗人”苗得雨和钟情于沂蒙山叙事的刘知侠、王安友，到新时期作家群：李存葆、刘玉堂、王兆军、赵德发、苗长水以及女作家陈玉霞、张恩娜等。他们创造的主体性特异的文学话语世界，不仅展现时代风貌和人物风采，而且语言能指将沂蒙气韵注入齐鲁文化现代转型的系统工程，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建构功能。文学超越社会认知的一般理念，以苦难、抗争、母爱、牺牲、胜利的复调主题营造狂欢诗学的杂语世界。概言之，沂蒙老区精神赋予沂蒙文学以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机制；文学解读向沂蒙老区文化精神覆盖，深入到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建构的层面，从而隐喻民族精神的指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知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的大体情形。

第一，沂蒙作家群创作的共同特征与思想意蕴的多倾向性共存。

王思玷是现代沂蒙文学滥觞的标志性人物。他 1921 年开始发表小说，短短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七篇作品，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茅盾称之为“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①。他的七篇作品的创作特色集中而鲜明。其一，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尤其是农民的苦难。他的处女作《风雨之下》通过一位老农民的自述，表现农民在暴风雨灾害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5

的摧残下的悲惨遭遇和苦苦挣扎的心境。茅盾对此评价说："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① 其二，集中体现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生活现实和有深度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偏枯》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道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瘟疫》，描写鲁南农村常年遭受兵匪之患的现实，透过农民面临兵匪之灾时的惶恐而苟且、心存侥幸的心理的揭示，将笔触探入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其三，沂蒙风貌和地域风采。以王思玷为肇始，上述三点逐渐成为沂蒙新文学的共同特征。由于时代思潮的更迭和作家审美取向的不同，这种共同特征表现在沂蒙作家群内部的具体文本中，又是神采各异的。比如写兵匪之患，20世纪20年代的王思玷着重揭示文化心理，四五十年代的沂蒙文学侧重革命气势的张扬，80年代的苗长水等的创作则转向人性审视。

从总体上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沂蒙作家的文化取向。一是乡土情怀。沂蒙作家群大都是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热爱家乡，钟情故土，笔墨中饱含乡土情怀。从王思玷的开山之作，到苗得雨的乡土诗《沂蒙春》，刘知侠的《沂蒙山的故事》，李存葆的《沂蒙九章》，不仅作品的题目醒目地标出"沂蒙"，文字间闪耀着的更是沂蒙山水的神采，跳动着的是沂蒙情思的灵感。刘玉堂以他特有的乡土笔墨，创造了一个魂牵梦绕的"钓鱼台"意象。本是一个无险无奇的所在，只因一份浓浓的故乡情，而变成一个情深意满的艺术世界。平平常常的人家，普普通通的故事，让人感受到淳朴和艰辛的同时，也感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受着只是这里才有的那份温情和不无苦涩的诗意。其实，沂蒙作家一如故乡人那般朴实，他们不会煽情，也无须渲染，那山，那水，那平凡的人物和平常的日子里，都充盈着沂蒙独有的风情。苗得雨有一首诗《多彩的山崮》，寄托对“山崮”这故乡特有风景的深情。无独有偶，在刘玉堂的《钓鱼台纪事》中也留下了描写“山崮”的浓浓的一笔，这里不仅是童年记忆中的故事场景，而且有几分神秘色彩，故事中的人物心情苦闷无以排解时，往往跑到这里寻求慰藉。这哪里是在浮泛地描摹像“山崮”这样的故乡山水呀，分明是在用挚爱这片热土的赤子之心拥抱故乡的风情和文化。二是启蒙意识。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沂蒙作家王思玷、刘一梦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把五四的启蒙文化带到了故乡，他们又借助小说创作，把启蒙文化的成果留在了文学史上。王思玷的《偏枯》所揭示的何止是身体的“偏枯”，更是在揭示精神的“偏枯”所造成的悲剧。这与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连的。后来的一次机遇是战争时期。只要读一读《红嫂》和《红日》这些指涉战争年代故事的作品，就不难理解启蒙意识给处于自然经济和宗法观念禁锢之中的沂蒙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些把“启蒙”与“救亡”截然分开的现成说法，往往会在社会现实和文学的想象世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诚如苗长水所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沂蒙山人的影响很大，它使沂蒙山人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很多沂蒙山人的命运，战争对沂蒙山人实际上是一次解放。”①第三次机遇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批富有

① 周志雄、李建英：《长长的流水 脉脉的温情——作家苗长水访谈录》，《当代小说》2003年第12期。

实力的沂蒙作家挟时代精神之风，正面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反思充满苦难和豪情的历史，直逼人性的现实和人的价值存在，在现代意识的感召下，锐意向沂蒙文化的深层结构开掘。无论李存葆写现代战争的篇章和写改革现实的长篇纪实文学，还是赵德发的长篇巨制“农民三部曲”，在对沂蒙文化的认知上都渗透着现代意识。尤其是王兆军和苗长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发扬蹈厉，对过去的战争和现实的变革的观照，采取了批判和反思的审视目光，给沂蒙文化注入了现代意识的新锐之气，在全国文学界和文化界也带来不小的震动。三是沂蒙精神。这是沂蒙文化的核心，也是现代沂蒙文学的总主题。沂蒙精神不是单维的存在，也不是单向度发展的。耕读文化中，它是勤俭淳朴和崇尚文明的；抗灾和抗匪文化中，它是坚韧勇毅的；战争文化中，它是向往正义和甘于奉献的；特别要看到，在多灾多难的历史变迁和新旧交替的文化转型中，它既是开拓进取，又是和谐宽容的。这些文化精神的特质，在文学中的表现虽然覆盖不均衡，但确实一一展现在沂蒙作家的审美视野之中。其中特别显著的是战争文化和转型文化的文学表现，突出“奉献”和“觉醒”两大主题。在革命战争的描写中，不论刘知侠的朴素故事，还是李存葆、苗长水饱蘸激情的抒写，都凝聚着沂蒙父老乡亲崇高的奉献精神。可以说，“奉献”之成为沂蒙精神美名远播的主题词，主要的是仰赖沂蒙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历史贡献，但也不可否认沂蒙文学所发挥的审美作用。王兆军和苗长水在写战争时代和变革现实时，以审美的反思和文学的批判，显示了针对深层文化结构的穿透力，围绕“觉醒”主题达到了能够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刘玉堂和赵德发面临社会的急遽转型，却能在“钓鱼台故事”和“农民三

8

部曲”从容以对，依据的便是对沂蒙精神中和谐宽容的文化内涵的剔抉和把握。

第二，在人物塑造方面，沂蒙作家的共同性表现为凝重的农民情结，个性化的文化认知大都融于地域性的文化体验。

他们的认知和体验大体可以看到三种类型。一是乡亲百姓。沂蒙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印记着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两类人物着墨最多，写得也分外精彩。一类是乡间小人物，一类是女性形象。沂蒙文化源远流长，但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地处相对偏远的山区，文化传承散落于广大民间，农民百姓成为沂蒙文化的主要载体。乡亲百姓集中体现着优秀文化传承，又体现着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文化存在是文学的必要资源，另一方面，作家情系沂蒙，对乡间小人物特别熟悉，特别有感情。于是，小人物反而成为沂蒙作家塑造人物的重头戏。刘玉堂的“钓鱼台人物系列”就是显著的例子。刘玉华言必称国家大事，颇有几分大人物的口吻，甚至还导演了“共产主义之夜”的大场面。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凡俗角色。他的自命不凡而又谨小慎微，说话做事的亦庄亦谐，恰恰映衬出善良淳朴的天性和小生产者的尴尬心理。刘乃厚更是农民形象塑造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小人物。他身材的矮小和心理的卑微与说话的故弄玄虚和做事的夸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既委琐又虚荣，既愚昧又善良。作家将其作为文化的隐喻，寄托的不仅是深深的同情，还有沉重的反思。沂蒙作家擅长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历史内容，寄寓文化的喻义。

女性话题对于沂蒙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女性解放的道路更为崎岖、漫长，另一方面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沂

9

蒙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步，留下了沂蒙文学特有的轨迹。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思玷曾在《偏枯》中让女主人公发出“我上了女人的当了”的呼声，可以解读为对于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女人身份的质疑，是对宗法文化提起的控诉。尽管作者身为走在时代前列的进步青年，可是，作品没有能够从女性解放的本体意义上提出问题，也就是说，尚未达到当时五四文化的时代水准，不能不说是当时地域文化的掣肘在起作用。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女性解放才张扬起高涨的态势，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解放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女性解放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战争与女性解放构成二位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学对此作出了热烈回应。突出的例子是《红嫂》。在刘知侠这篇具有纪实性特征的小说中，红嫂的形象无疑是沂蒙革命女性的化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解读，这是崇高的革命性与高尚的女性双重内涵的象征，即革命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同构。作品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可以肯定地说，正是革命战争为沂蒙女性的解放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文化本身进一步思考。在肯定其文化进步性的同时，仍须看到作为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性与作为个体的人本主义的女性二者关系中的不完全对称的现象。换言之，革命战争的文化语境既不可能全面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也不可能在女性本体价值的意义上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这种文化思考，同时期的文学没有来得及提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一思考才受到沂蒙作家的普遍重视。女作家张恩娜清醒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晚霞中》的主人公出身童养媳，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然而，由于未能明确“人”的解放的目标，在这位革命者身上的“妇女解放”终

10

于半途而废了。这种曾经一度走上妇女解放道路，又重陷旧文化的循环之中的文化反复现象，很能发人深省。它在文化意义上揭示了，只有从人本主义出发，才能找到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与此同时，苗长水等男性作家更是从文化超越的意义上塑造了范素盈（《犁越芳塚》）、润儿（《染房之子》）等发人深思的文学形象。从沂蒙文学在几个发展阶段上女性形象塑造的简单回顾可以想到，文学在地域性的文化发展中不断发现文学的资源，同时，文学又以审美发现的方式反哺地域性文化，促使其按照文化的历史逻辑不断发展。

二是悲剧农民。沂蒙文学在历史上不乏悲剧文本，但是真正凭着文化的自觉来塑造人物的，应当说是始自新文学。因为意识到现实社会和历史条件的无以适应和难以协调，特别是意识到在现实生存中与“隐蔽的缺陷”的斗争，实际上是与旧的文化遗存之间的对立的反映，需要现代意识引领下的文化自觉。王思玷和刘一梦这一代作家就已具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他们作品的标题就显然带有农民命运的悲剧意味，比如王思玷的《偏枯》《瘟疫》，刘一梦的小说集《失业之后》，标题所显示的便是天灾人祸、人生挫折等可悲境遇。如果说这一时期文学对农民悲剧的关注并非偶然，那么，悲剧农民的形象在新时期沂蒙文学中接踵而至，就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这些悲剧人物的身上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其一，由于农民的文化准备不足，当社会文化的转型骤然而至时，难免失落和无奈。刘玉堂“钓鱼台人物系列”，特别是《最后一个生产队》中人物的悲剧情态便属此类。其二，旧的文化意识回光返照式的禁锢。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中田家祥的英雄末路，原因主要是农民文化积淀中沉疴的旧病复发。其三，人性

11

的缺陷造成的悲剧。这种悲剧形态在新时期沂蒙文学的人物塑造中是普遍性的存在，可视为沂蒙文化的时代特质。这种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普通百姓（如刘玉堂笔下的刘乃厚、牟葛彰）和柔弱女子（如赵德发笔下的素素、费左氏）的身上，甚至也表现在像田家祥这样的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身上。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农民悲剧就与王思玷那个文学时代的悲剧形象有了明显分野。《瘟疫》、《偏枯》中的悲情是哀其不幸的悲愤呼号，新时期沂蒙文学的悲剧意识不仅转向悲壮的抒写，而且更增添了现代理性的文化关注。

三是英雄气象。与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不同，英雄气象是指沂蒙精神凝聚而成的文化核心，处于沂蒙精神的中心地位。同时，又指沂蒙精神辐射而成的文化气象，是英雄精神经由文学的审美中介转化而成的覆盖极广的文化现象。首先是红嫂现象。红嫂的形象一经出现在文学中，立即赢得社会的广泛称誉。在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以女性的高尚情操为特征的奉献精神，成为英雄精神的鲜明标志，形象性地丰富了沂蒙精神的文化内涵。其次是群体现象。之所以没有强调英雄典型，而是称之为英雄的群体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沂蒙文化中的英雄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普遍存在，只有写出英雄精神的群体形态，才能客观准确地体现沂蒙精神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正逢新时期文学“从英雄到普通人”转向的创作趋势。作为对“三突出”荒谬逻辑的反拨，这一创作趋势在文化和文学上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于是，英雄的群体性的艺术表现得到了文学思潮的支持。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英雄辈出，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中的群英争雄，正是沂蒙英雄群体性的文学诠释。英雄的形象星罗棋布，

12

闪耀在沂蒙文学的人物谱系里。再者是新人现象。新时期的沂蒙文学涌现出一批新人形象。刘玉堂的长篇小说《乡村温柔》中的牟葛彰在沂蒙文化的传承中，历经“走出沂蒙”、“走向荒原”和“创业之路”的人生波折和不懈奋争，终于在经济大潮中造就了一番事业，并且将创业成果奉献给社会。这是一位在奔腾不息的社会潮流中勇立潮头的新人。《沂蒙九章》纪实性地选择了社会变革中的弄潮儿，着力发现这批人身上的新人品质。苗长水的《染房之子》中的润儿，带着心灵的旧伤痕迎接时代的洗礼，在重振染房大业的壮举中闪射出新人的光彩，堪称“破茧而出”的隐喻。这些新人没有被写成具有典型品格的英雄形象，但却体现着沂蒙人特有的英雄情结。比起传统的英雄诠释，又生成了崭新的精神特征，这就是既勇于进取，开拓创新，又和谐宽容、协调发展。这批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既身披沂蒙精神传承的霞彩，又辉映着新的时代品质，指涉着在沂蒙精神感召下新人辈出的新的英雄气象。

第三，沂蒙作家的创作心理与沂蒙文化存在同构关系，其话语方式与沂蒙文化存在对应关系。

将沂蒙生活收入创作视野的有两类作家，一是生长在本乡本土的当地作家，一是来沂蒙工作过的外地作家。前者是沂蒙文学的主体。他们与家乡百姓血肉相连，与沂蒙文化有着直接联系。这种联系既来自生活亲历的文化记忆，又来自走出故乡后（或进高校深造，或经历部队锻炼），对故乡生活的回顾和文化反思。后者大都怀着创作的目的介入沂蒙生活，旨在采撷叙事的本事和抒情的灵感。因为他们的专业化身份，目的明确，所以在艺术开掘中不乏有价值的发现，比如刘知侠的《红嫂》。可惜的是，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形成了文学创作更可以大

13

有作为的文化空间，外地作家却没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开发这一蕴藏丰厚的创作资源。新时期沂蒙文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本地作家取得的。无论当地作家还是外地作家，他们的创作与沂蒙文化都存在着同构关系，不仅表现于题材和主题上，更存在于创作心理和话语方式的深层联系之中。为了说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对以下三个类型进行观察。第一类，民间话语型。定位于乡土本色，采取农民视角，着眼于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以及生存本相，尚义向善、达观宽容的乡俗民情，既有几分蒙昧又有几分智慧、善于自譬自解的微妙心态，以及不时地演绎着的带有沂蒙特色的乌托邦喜剧。叙事话语凡俗而庸常，农民本位角色化的自说自话，幽默中的自嘲，风趣中的苦中作乐，将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历史化作轻盈、温馨的叙事。刘玉堂是运用民间话语的高手。他将沂蒙农民的日常言语加以审美化改造，创造了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他的“钓鱼台系列”用幽默的话语展示农民的情感世界，将严峻浸润在乡亲的温馨情趣中，以农民式的智慧化解社会历史的沉重和苦涩，在淳朴的乡情民风与严峻的历史教训、轻松的调侃嬉戏与充满艰窘苦难的经历、似是而非的叙事与故事的深层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独特的反讽结构。刘玉堂自称是“沂蒙的儿子”。他生于兹长于兹，部队转业后又曾回故乡的县城工作多年。他热爱故乡，熟悉乡亲的生活，钟情于沂蒙文化。在沂蒙文化与刘玉堂的创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源流关系。刘玉堂以及与他同类型的作家的成功在于，在沂蒙文化的孕育中，实现着文学叙事和话语方式的主体性创造。第二类，启蒙话语型。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本意识为依归，在崇尚沂蒙农民高尚的正义感和可贵的同情心以及奉献精神、诚挚美德的同时，将笔下人物置于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现

14